

https://farid.ps/articles/trump_plunging_the_world_into_chaos/zh.html

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制裁：对国际正义和“永不再来”遗产的背叛

2025年2月7日和6月5日，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国务卿马可·卢比奥的领导下，美国谴责国际刑事法院（ICC）为非法和政治化机构。他们对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以及法官索洛米·巴伦吉·博萨、卢兹·德尔·卡门·伊巴涅斯·卡兰萨、雷恩·阿德莱德·索菲·阿拉皮尼·甘苏和贝蒂·霍勒施加了制裁，以报复他们在调查以色列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中的角色。这些措施，包括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明确旨在报复国际刑事法院于2024年11月24日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发出的逮捕令，并阻止对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和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可能因推动非法定居点和加剧加沙人道主义危机而面临的指控。这种前所未有的干涉威胁到法院的运作，并削弱了全球在大屠杀后对普遍问责制的承诺。

本文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超越口头谴责，强制执行问责制，包括对以色列和美国实施经济和外交制裁，对唐纳德·特朗普和马可·卢比奥提起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以及激活欧盟的阻断法规以保护法院及其官员免受美国的过度干预。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种族灭绝案例

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将种族灭绝定义为意图全部或部分摧毁一个民族、种族、族裔或宗教团体的行为，包括杀戮、造成严重身体或精神伤害，或强加旨在导致物理毁灭的生活条件。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以令人担忧的清晰度满足这些标准。系统性地限制人道主义援助，针对平民的攻击——包括援助工作者、紧急服务人员、医务工作者和记者——以及摧毁医院等关键基础设施，显示出有意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物理毁灭的意图，符合1948年《公约》第二条对种族灭绝的法律定义。国际刑事法院于2024年11月21日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出的逮捕令，指控他们以饥饿为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确认了这一法律评估。

国际特赦组织2024年12月的报告明确得出结论，以色列的封锁系统性地剥夺了巴勒斯坦人对食物、水、医疗物资和燃料的获取，构成了通过创造旨在摧毁巴勒斯坦人口的条件而进行的种族灭绝。联合国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在其2024年3月的报告《种族灭绝的剖析》中，指出存在“合理理由”认定种族灭绝，引用了超过54,60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00,000人受伤，以及加沙人口被限制在仅15平方英里的区域，导致疾病和饥饿泛滥。斯德·泰曼等拘留营中的性暴力报告进一步表明，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尊严和生存的种族灭绝意图。

以色列官员的言论支持了这些发现。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2023年10月的声明，将所有巴勒斯坦人与哈马斯混为一谈，暗示有意针对整个群体，而不仅仅是战斗人员。部长斯莫特里奇呼吁“加沙连一粒小麦都不能进去”，本-格维尔倡导吞并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反映了种族灭绝意图。这些言论和行动，在美国的军事和政治支持下，不仅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还背叛了大屠杀后时代“永不再来”的普遍承诺。

破坏“永不再来”：纽伦堡的回响

“永不再来”的承诺源于大屠杀的恐怖，并在纽伦堡审判中得以体现，建立了将暴行肇事者不论其地位如何都追究责任的全球承诺。纽伦堡审判对纳粹官员进行了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的起诉，尽管他们反对法庭的合法性。美国的行动和声明反映了纳粹关于国际法庭侵犯国家主权的论点。这一相似性不仅是历史性的，而且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纽伦堡审判确立了个人，包括国家领导人，对国际罪行负有个人责任的原则，这一原则在管理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中得到编纂。美国制裁通过针对履行司法职责的法官，违反了《罗马规约》第70条e款，禁止对法院官员因其工作而进行报复。这种恐吓行为通过保护肇事者免受问责，破坏了纽伦堡的遗产，助长了背叛“永不再来”承诺的免责文化。

阿波菲斯、拉和玛特隐喻

在古埃及神话中，混乱的邪恶化身——蛇形怪物阿波菲斯，每晚在冥界滑行，试图吞噬真理、正义和宇宙秩序的圣女神玛特，将世界陷入永恒的黑暗。塞特用他的长矛，伊西斯用她的魔法，托特用他的智慧保护玛特，直到黎明破晓，拉的光芒最终击败黑暗的力量。

同样，以色列通过在加沙的行动和美国通过保护其免受正义制裁，将我们的世界陷入黑暗。国际刑事法院的125个成员国组成的国际社会现在必须承担玛特的守护者角色。像塞特用长矛刺穿蛇心一样，对以色列和美国实施制裁，像魔法盾牌一样使用欧盟的阻断法规保护国际刑事法院及其官员免受美国制裁，并利用法律专家的智慧对实施和支持种族灭绝的人提起指控。真理和正义的守护者必须果断行动，防止世界陷入混乱和黑暗。

果断国际行动的需要

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专家和人权组织对美国制裁的口头谴责不足以对抗对国际正义的这种攻击。国际社会必须果断行动，保护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并确保问责。首先，国际刑事法院应根据《罗马规约》第70条d款和e款，对美国官员，包括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国务卿马可·卢比奥，提起妨碍司法行政的指控。他们的行政命令和制裁构成了故意阻碍、恐吓和报复法院工作的行为，符合起诉标准。如此大胆的举措将重申国际刑事法院对公正的承诺，并阻止强大国家的进一步干涉。

其次，拥有27个《罗马规约》缔约国的欧盟必须激活其阻断法规（欧盟理事会法规（EC）第2271/96号），以抵消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应。该法规旨在保护欧盟实体免受外国制裁，可以禁止遵守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美国措施，确保欧洲银行和机构不冻结法官的资产或限制其活动。通过援引阻断法规，欧盟可以保护国际刑事法院在其管辖范围内的运作，并表明它不会容忍破坏国际正义的企图。

第三，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必须通过增加资金、在执行逮捕令方面的合作以及公开重申法院授权来加强支持。这些行动将对抗美国制裁的寒蝉效应，人权活动家警告这可能威慑其他冲突地区的证人并阻碍调查。未能果断行动将有侵蚀公众对国际法律体系信任的风险，并鼓励其他国家效仿美国，进一步削弱国际刑事法院为全球暴行受害者伸张正义的能力。

结论：恢复正义的平衡

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制裁是对国际正义原则的直接攻击，呼应了纽伦堡纳粹官员的挑战，破坏了“永不再来”的承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以种族灭绝意图的系统性大规模谋杀为特征，要求问责，但美国的干涉保护了肇事者并延续了免责。阿波菲斯、拉和玛特的隐喻强调了风险：让混乱占上风威胁到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全球秩序。国际社会必须果断行动，通过对美国官员特朗普和卢比奥提起妨碍司法的国际刑事法院指控，并激活欧盟的阻断法规保护法院及其官员。只有通过这种果断措施，纽伦堡的遗产才能得以保存。以色列可怕侵略的受害者要求并应得正义。